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经验论析

冯红伟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阶段,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验主要包括:译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首要前提,著书立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基础,创办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力保障,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效形式,科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方法论指导。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工作仍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译介理论;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5;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088-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10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801}全面抗战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革命面貌日新月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国统区在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统治下,革命前途一片黯淡,革命群众困惑迷茫,亟需科学理论为其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及爱国进步人士从团结抗日、实现民族独立的大局出发,毅然冲破重重阻力,为国统区民众送去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和影响下,国统区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当前学界对其的关注并不够,总体而言,研究还较为薄弱,有待拓展和深化。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较为详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经验进行总结,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这对于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译介理论是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首要前提

译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层面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而言,这里存在着一支实力强大的翻译队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冯红伟(1989—),女,山东济南人,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性锻造研究”(19DJ05)。

伍,他们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研究者的著作,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军事等诸多领域。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武器”^{[2]39},毛泽东曾多次号召理论工作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宣传,帮助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国统区的理论工作者响应号召,积极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重庆生活书店就出版了邹韬奋的《读书偶译》,该书作为“一种漫笔式的译述”^{[3]318},其中就包括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部分章节的译述。1937年12月,时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的张仲实翻译了《费尔巴哈论》一书,作为“世界名著译丛”之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与过去的版本不同,这个译本除了正文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外,还收录了当年苏联《真理报》为纪念费尔巴哈逝世六十五周年的两篇文章:《伟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与新兴哲学》”^{[3]319};其翻译的另一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941年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发行,“这个译本所包括的俄文版主编阿多拉茨基加的注释及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场合》等,都是过去的中译本所没有的材料”^{[3]319}。几乎与《费尔巴哈论》同一时间出版的还有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也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8年5月,新汉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汉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9月,郑九星翻译的《列宁底史的唯物论》由上海启蒙出版社以专题文摘的形式出版,11月,言行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41年2月,张申府翻译的恩格斯《辩证法》由重庆的《中国教育》期刊刊发在第1卷第7期上。此外,还有一些译著的出版日期不详。比如读书出版社出版了尤琴著写,高烈翻译的《伊里奇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该书详细介绍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唯物论观点和主张,对于当时俄国存在的经验主义给予了猛烈批判,并结合俄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哲学的贫困》由桂林的新华日报出版社翻译出版。就译文而言,《群众》周刊第6卷第3、4期合刊发表了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写给约·布洛赫的回信;第7卷第15、16期连载了萧格洛夫著写,北泉翻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之发展》,该文详尽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及主张,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与他们的实践经验及政治观点的形成是分不开的;第7卷第20期刊登了《列宁和斯大林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全面梳理了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其他的诸如《现代自然辩证法引论》《辩证法法的法则与方法》《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观念和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译文也先后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原理作了系统介绍。这些著作和文章为国统区民众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文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和纵深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4]全面认识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关键。《资本论》作为其中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中国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一部完整的译本。为了让国人能尽快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1937年初,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比较好的《资本论》全译本,时任负责人的黄洛峰、艾思奇和郑易里等找到王亚南和郭大力,决定出版由两人合译的《资本论》,1938年8月31日,第一卷正式出版,9月15日,第二卷出版,9月30日,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至此,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中译本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郭、王二人是按照德文版翻译的《资本论》,但德文版各卷后面的附录部分在出版时并未译出,为了能够带给读者最全面、最权威的中文译本,郭大力把这些宝贵的资料也全部翻译成了中文并汇编成书,命名为《资本论通信集》交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9年出版,“这本书收编了二十五封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书信、恩格斯的《〈资本论〉述评》、马克思的遗稿《评瓦格纳〈经济学教程〉》和恩格斯的遗稿《〈资本论〉第三卷补》等等”^{[3]313}。“在《资本论》出版前后,该社还出版了章汉夫、许涤新合译的《恩格斯论〈资本论〉》,郑易里翻译的《〈资本论〉的文学构造》等等。”^{[3]313}与此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西流翻译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易解》;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沈志远翻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合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在其创办的《理论与现实》杂志的第2卷第1期发表了彭迪先翻译的马克思未发表的遗稿《资本生产物的商品》,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1982年版),标题译为《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1939年,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言行出版社出版。此外,由M·米丁所作,戈宝权所译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群众》周刊第3卷第25期上刊登。《理解资本论所必需底预备知识——怎样研究资本论第一章(上、下)》《二十余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底对照》《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八十周年纪念》《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论经济与政治》等也先后刊登在《群众》周刊上。通过学习和研读上述著作和文章,国统区的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一定的认知和了解,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对其持续深入思考后逐渐转向了认同和接受。

(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科学社会主义既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循,又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为支撑,不断加强和完善关于未来社会的顶层设计,为苦苦探寻国家出路的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方向,确立了基本遵循。为使民众更加明晰其内容,更好坚持其原则,国统区掀起了一股译介、宣传与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

1938年3月,莫师古翻译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同年10月,中国出版社在武汉重印发行了8月由延安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1月重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华日报馆于1939年2月在重庆出版了吴黎平、刘云合译的《法兰西内战》。1940年2月徐冰翻译的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由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其翻译的另一篇列宁的文章《纪念巴黎公社》刊载在《群众》周刊第4卷第8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和革命需要,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建设思想。《群众》周刊作为国统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为列宁政党建设思想的诠释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卡罗绳著、卢竞如译的《列宁和斯大林论干部》和I·梯特金著、戈宝权译的《列宁的〈做什么?〉一书的提要》刊发在《群众》周刊第4卷第5期上;E·布尔若洛夫著、戈宝权译的《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刊发在《群众》周刊第4卷第6期上;《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刊登在《群众》周刊第7卷第15期上;《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在该报刊上连载,从1939年第3卷第1期起,到1940年第5卷第16期完,共刊登了40篇文章,系统介绍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发展。通过学习上述著作和文章,国统区的民众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担当,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汲取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诸多智慧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国统区内逐渐被树立起来。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抗战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5]847},“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5]848}。基于此,广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宣传。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于1939年11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了包括《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恩格斯的巴尔扎克论》《恩格斯的易卜生论》《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等在内的六篇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文章。《群众》周刊先后刊登了《列宁论文化》《列宁论艺术及其他》《列宁论托尔斯泰》《列宁论高尔基——为纪念高尔基逝世八周年》《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论俄国社会运动和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等关于列宁文艺思想和主张的系列文章。通过这些

著作和文章,国统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此外,乔木翻译的《马克思论文学(上)》刊发在1944年1月27日发行的《新华日报》第4版上;1941年1月,戈宝权翻译的《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刊发在《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1942年6月,重庆的《中苏文化》第11卷3、4期合刊接连刊发了两篇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分别是《列宁论托尔斯泰与其时代》《列宁论托尔斯泰与近代工人运动》。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增强了国统区民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国统区的团结抗战局面。

(五)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6]397}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是确保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各民族团结合作,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解放这一共同目的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抗战时期,民族独立和统一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自然成为传播的重中之重。1938年迎来了全面抗战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国统区传播的第一个高潮,相关著作和文章被接连译介和出版。1938年3月,方乃宜翻译的《马恩论中国》由武汉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同年4月,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史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由火炬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由新汉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唯真翻译列宁的《马克思与民族战争问题》刊载在《群众》周刊第2卷第5期,钱亦石翻译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同年11月,杨克斋翻译马恩合著的《中国问题评论集》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发行。此外,郭和翻译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39年1月出版发行,丁宗恩编译的《论弱小民族》由上海北社于1940年5月出版发行,卢竞如翻译的《列宁论中国》由重庆的文蔚书店于1940年7月以专题文摘形式出版。这些著作和文章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有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性分析,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

(六)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译介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不是用来束之高阁的,而是用来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的”^[7],其对于国统区的抗战具有最直接有效的现实指导意义,国统区的爱国将领和革命民众渴望学习和掌握这一军事理论。《群众》周刊第6卷第1、2期合刊上曾连载了两篇关于恩格斯的军事思想的译文。一篇是爱尔·白特罗夫所著,夏迪蒙所译的《恩格斯与军事科学》,该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恩格斯的战争学说,包括恩格斯对战争的性质、起源、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等问题的看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恩格斯的军队学说,包括恩格斯对军队的本质、军队的产生、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的认识;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恩格斯的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另一篇是纪龙翻译的《恩格斯的军事经验》,该文主要从军队应代表先进阶级的利益、应反映时代客观要求、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三方面对恩格斯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列宁关于战争认识和看法的系列文章,也在国统区内被广泛译介和出版。刘少严翻译的《论世界大战》于1939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专题文摘形式出版,平生翻译的《论战争笔记》于1940年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焦敏之翻译的《列宁战争论》于1940年由重庆读书出版社以专题文集形式出版,《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和卢森堡的错误》则刊载在《群众》周刊第6卷第5、6合期上。这些著作既是国统区民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丰富素材,也是国统区民众革命抗日的重要法宝。

除上述提及的理论外,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也在国统区被译介和传播。以妇女理论为例,1938年5月,列宁的《论妇女、女工和农妇》由武汉的中国出版社以专题语录的形式出版;焦敏之翻译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中女工运动底任务》刊发在《群众》周刊第4卷第7期上;1942年2月,茜萍翻译列宁的《国际妇女节》刊发在《群众》周刊第7卷第4期上。这些著作和文章对于做好国统区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国统区的出版和传播概况,本文对国统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出版作了一定梳理,详见表1。

表1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国统区的译介和出版概览

时间	马恩著作(部/篇)	列宁著作(部/篇)	国外相关研究(部/篇)	合计
1937	3	2	1	6
1938	11	14	1	26
1939	7	1	0	8
1940	2	13	2	17
1941	4	2	3	9
1942	0	4	1	5
1943	0	1	0	1
1944	1	3	1	5
1945	1	0	0	1
时间不详	1	1	11	13

表中数据是在查阅相关文件、著作等基础上整理而成,由于资料有限,统计难免会有一定疏漏。但从当前统计中仍可以看出,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国统区的译介和出版以1938—1941年最为集中,这与抗战初期动员国统区人民团结抗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理论支撑有极大关系,再次证明革命运动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

二、著书立说是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何实现其本土化,使其符合国统区区情,更好地指导国统区民众抗战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国统区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编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反映真实抗战的系列作品,使得国统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具象更精准,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总能“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8]2},“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9]11}。基于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形成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历史镜鉴中探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先总述了历史哲学的任务、发展以及历史哲学的阶级性,然后又分章节具体介绍了历史哲学的一些特性,包括历史发展的合法性、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最后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一些问题,该书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一部典范。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叙述了中国从原始公社制时期到崩溃的明清时期的发展历史,试图从对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分析研究中找寻中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答案。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棠棣之花》《屈原研究》、尚钺的《释禹——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著作也都是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完成且到今天仍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史学著作既是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体现,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为新时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

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文艺应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从国统区的革命现实出发,文艺工作者喊出了“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形成了具有国统区特色的抗战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10]68}抗战期间,生活在国统区的艺术工作者不忘初心,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国统区抗战现实的抗战作品。“1939年4月下旬至5月4日,老舍为给‘文协’筹款,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抗战话剧《残雾》。这部四幕话剧揭露与鞭挞了大后方的贪官污吏沟通汉奸,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11]149}1940年1月,为号召国统区民众团结抗日,老舍与宋之的以国统区回汉两族同胞团结抗日的故事为选材,合写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同年6月至8月,应军界朋友之约,老舍以张自忠将军坚持抗日,以身殉国的事迹为背景,创作完成了话剧《张自忠》,从而鼓舞了国统区的民众更加奋勇御敌。1944年1月,老舍以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生活为背景,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在重庆创作完成,其严厉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给予广大贫苦的中国人民深切同情,呼吁广大人民团结起来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沙汀的代表作《在其相居茶馆里》紧紧抓住兵役问题这一题材,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破坏抗日的丑陋面目,极力号召国统区的人民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真正实现全国团结抗日,因为只有保住了国家,个人的私利才能有所依托。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极为讽刺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部分人士虚伪谎言、浅薄庸俗而又色厉内荏的性格。袁水拍的《海内奇谈》《新生活》《国大代》等诗歌,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揭露其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陈白尘创作的戏剧《升官图》以强盗的升官发财梦为掩护,对国民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揭露和批判。舒模为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而创做了歌曲《你这个坏东西》。史东山担任导演、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拍摄的电影《抗战特辑》第三、四、五集以及《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等新闻纪录片,记录下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以及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抗战演讲活动。这些影片在国统区产生了极大反响,激起了更多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此外,为了既能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审查,又能让更多国统区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实践摸索中还创作出了具有国统区特色的“讽刺文学”等文学体例,形成了“七月诗派”等进步团体。总之,完成于抗战期间的诸多文艺作品成为国统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5]848}。

除历史和文艺外,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者也是笔耕不辍,涌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凯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由中国文化社于1938年6月出版,该书从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时代意义等方面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阐释。吴大琨的《新哲学概论》由生活书店于1939年4月出版,其着重论述了马列主义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并对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理论作了详尽解读。吴克坚、潘梓年等编著的《苏联之成败与中国抗战》由创造文粹社于1941年9月出版,该书主要对苏联革命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以期能为中国抗战提供启示和镜鉴。可以说,著书立说既使国统区民众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学习材料,又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创办报刊是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力保障

全面抗战时期,报刊因其所特有的时效性、大众性优势备受中国共产党及党外进步人士的青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形式和载体之一。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发行的两份合法报刊,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这两份报刊的作用,在上面发表了多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章,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系列的理论成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前文所提译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以及

介绍俄国发展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俄国为什么废除了农奴制度》《劳动解放社》等都曾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以节选或连载的形式刊登过。就党内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而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潘梓年的《列宁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伍辛的《马克思的文学的现实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也曾在《新华日报》或《群众》周刊上发表。通过这些著作和文章,国统区民众既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和发展轨迹,又可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其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除了共产党创办的报刊外,国统区内还存有诸多党外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比如四川青年救国会的会刊《救亡周刊》、以团结进步妇女为宗旨的《妇女呼声》、新疆学院的院刊《新芒月刊》、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创办的《反帝战线》、郭沫若担任社长的《救亡日报》、胡绳任主编的《救中国》周刊、胡风创办的《七月》《希望》等等。这些进步刊物刊登的内容大都以抗战救亡为主题,勇于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极力支持和拥护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积极刊发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社论。在所有报业人的努力下,各种进步报刊在国统区内顽强地生存着,并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了泣血抗争,成为鼓舞和动员广大国统区民众团结抗战的武器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得以接续传播的重要力量。

四、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效形式

为了彻底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恶语中伤,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扩大“朋友圈”,在交流沟通中增强国统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认同。

统一战线思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著作中,其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列宁则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的内涵。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共同章程》,恩格斯1840年10月17日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的文章《唯物论和虔诚主义》、1847年所作的《论波兰》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都包含着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善于团结争取其他一切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力量,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极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国民党及国统区民众共同抗日。1937年8月15日党中央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中共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书》、1942年6月20日公布的《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等等,均强调只有包括国统区民众在内的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并积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实现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2]355}。

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学习领会基础上,结合国统区的实际,对于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划部署。就方针而言,以“帮助友党、友军进步”^{[13]43}“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13]43}为重点,同时“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13]43}。对于反动顽固分子的斗争,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不过,对这种人仍是自卫的性质。”^{[13]44}比如针对有些顽固反动分子四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反动性”的情况,要做好“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13]44}的工作,“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

反对复古的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13]44}。就方法而言,斗争上既坚持立场,又讲究灵活机动,组织上既避免暴露,寻求实际的发展,又不能走向死路或自投陷阱。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共产党人主动同国统区的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左翼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工商界进步人士、爱国华侨及宗教界爱国人士等各界人士加强沟通和联系,向他们赠送马列著作和书籍,同他们探讨时局发展,指派共产党员协助他们工作,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中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

在与中共的多次接触和交往中,国统区的爱国人士对时局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清晰,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表示赞同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代言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或奋笔疾书,或公开演讲,或课堂讲授,他们以自己所擅长的方式极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民主进步人士中,比如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的沈钧儒,文化界先锋人士邹韬奋,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被看作是民主人士的“灵魂人物”的宋庆龄,等等,他们极力支持和拥护中共所提议和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多次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与中共合作抗日。针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底,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日趋分裂的危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爱国人士致电痛斥蒋介石。鉴于一些人对统一战线存有误解,1941年10月,宋庆龄在《中国需要更多民主》一文中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名称并非偶然叫出来的,它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14]341}，“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14]341},统一战线要求“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14]342}。此外,主张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则减少了对中共的活动限制;爱国青年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举办系列马克思主义宣讲活动,利用寒暑假时间下乡宣传;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商界爱国人士及爱国华侨则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援助。广大国统区的一切爱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均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切从大局出发,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勇于揭露蒋介石假三民主义的政治欺骗性,向国统区民众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五、科学思维是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方法论指导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5]875}思维方式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深刻性、独立性、批判性等特点,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重要法宝。全面抗战时期,理论工作者重视并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是坚持底线思维,在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顽强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底线思维是一种“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6]60}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要求人们要始终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顽固阻挠和“高压”限制,面对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民主进步人士,高举合作抗日的正义旗帜,在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顽强斗争中,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新闻出版人士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审查,在印刷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他们经常以不同出版社的名义进行刊印,而且书籍名字多以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名字命名,从而使这些书籍避免了被查封的厄运。进步报刊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变换了编排手段,在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时或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即将一篇文章分成零散的多个部分进行刊登,或采取“开天窗”、改登“更正”或“启事”等办法间接地向读者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功地躲过了国民党的审查。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

讽刺的手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寓于文学作品中。国统区的理论工作者不断创新传播手段,灵活运用传播方法,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不懈斗争,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限制,汇聚起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强大合力”。

二是坚持辩证思维,在整体性与协调性的有机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辩证思维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7]187}。理论工作者在将国统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同时,又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在统筹考虑政治环境、传播对象等因素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三因”策略,即因地制宜、因势而异、因材施教。所谓因地制宜,即根据国统区各地的具体实际,选取适宜的传播方式。国民党民主派、抗战派所管辖地区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多是公开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领域惯用“高压”政策,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只能选择隐蔽的方式。地方实力派既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又担忧蒋介石的军事报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摇摆不定,在其管辖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是公开与秘密两种方式并用。所谓因势而异,即根据变化的形势制定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策略。抗日战争处于防御阶段时,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比较积极,国统区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以公开方式为主。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抗日变得消极,对反共变得积极,禁止在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面对极为不利的政治形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秘密方式为主,注重保存和发展骨干力量。抗日战争处于反攻阶段时,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军队接连失利,为了挽回民心,蒋介石作出了一定的民主姿态,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采取的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理论工作者基于形势变化而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使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高压”政治环境中仍实现了较广范围的传播。所谓“因材施教”,即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国民党高层中的民主人士文化素养较高,学习能力较强,因此理论工作者便向他们推荐和赠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书籍,希望他们在学习和研读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了解。广大工农群众文化水平比较低,难以读懂晦涩的理论知识,因此理论工作者给予了他们更多辅导性的帮助,借助报告会、学习班、歌剧、戏剧、电影、音乐、话剧等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理论工作者基于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国统区的各个阶级和不同阶层。

三是坚持系统思维,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良性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系统思维要求用联系、整体、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成功传播是解放区与国统区良性互动的结果。党员队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力量,亟需补充和扩大。以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为例,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了解放区的吸收原则,在此基础上指出,国统区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解放区的吸收原则基本适用,同时还应更多注意他们的忠实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的严密,从而为国统区党员队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充实了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量。就具体实践而言,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的120名学生曾到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1944年,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曾到重庆,向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传达《讲话》精神并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和刁难,他们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和惊人的智慧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迫害,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国统区的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与之相对应,国统区的理论工作者也积极借鉴学习解放区的有益做法。在延安,为配合整风运动所开展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文艺下乡运动等做法得到了国统区理论工作者的肯定和赞赏,郭沫若、矛盾等人将其积极运用到国统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提出“面向农村”以及“农民文艺”等主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更好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资料组,编.毛泽东同志论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60.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4]周文.让政治经济学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前沿[N].人民日报,2018-05-07.
-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张树德.论改革开放40年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经验[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1).
- [8]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9]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0]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1]朱猷武,王俊芳.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Total Anti-Japanese War

Feng Hongwe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was a stage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mainly includes: translation theory is the primary premise; the writing of books is an important basi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the united front is an effective way; scientific thinking is th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still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ity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otal Anti-Japanese War; spread of Marxism; translation theory; the united front

[责任编辑:孟西]